

嘉兴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服饰形态及成因

刘鹤 余美莲¹

(嘉兴学院设计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0)

【摘要】: 李氏墓是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文化家族墓葬, 基于其出土文物, 结合明代中后期社会背景和审美意识, 从形制、纹样、质地、工艺等方面研究出土服饰的形态特征, 论述服饰制度、社会风尚、思潮文化、行业发展对服饰形态特征的影响, 认为出土服饰形制新奇多样、纹样多元丰满、面料高贵精美、装饰精巧细腻, 其独特的形态特征印证了明代中后期经济繁荣背景下求新趋异的服饰审美和奢靡、世俗化的社会风尚, 反映了墓主人李氏家族显赫的身份和地位, 同时也佐证了明代嘉兴地区高超的织造技艺。

【关键词】: 明代 李氏墓 出土服饰 形制 纹样 社会风尚

【中图分类号】: TS941. 742. 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22)02-0026-08

明代作为古代服饰文化发展重要的朝代, 服饰制度“上采周汉、下取唐宋”, 在继承先制的基础上, 凝练升华不断创新, 成为中国近世服饰艺术的典范。明代中后期由于中央集权衰弱, 商品经济活跃, 社会观念转变, 服饰审美由明初的朴实无华和整齐划一逐渐向新奇和多样性转变, 形成逾礼越制、尚奢竞靡、追新逐异的服饰潮流。如图 1 所示, 明初官员团领袍衫承唐制, 服装款式趋于一致, 而明嘉靖年间服饰求新逐异现象突出, 文人雅士着装虽然都为袍衫制, 但服饰在衣领、衣身、帽形等处不尽相同(图 2)。嘉兴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服饰正值明代中晚期, 其服饰形态大体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特点。



图 1 明正统二年(1437)杏园雅集图

作者简介: 刘鹤(1980-), 男, 河北承德人, 嘉兴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传统纺织服饰文化;余美莲(1978-), 女, 江西余干人, 嘉兴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民间服饰文化。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18NDJC078YB)



图 2 仇英(明嘉靖年间)竹院品古图

嘉兴王店明代李氏墓是一处四室合葬墓，包括墓主李湘、正妻陈氏及妾徐氏。李湘一脉“世本江阴人。明洪武初，官提举行十四者始迁嘉兴，其后子孙分隶嘉兴、秀水两县籍”^[1]。李氏家族为嘉兴一大望族，明清时期官宦累出，李湘之孙李原中任国子监助教，代表朝廷巡视地方盐务；明天启年间，李湘之孙李衷纯在扬州出任两淮盐御史；清朝康熙五十四年(1715)，李楠曾孙李陈常任两淮盐运使。“以诗书传家”是李氏家族最大的特点，从墓主李湘之子李芳开始李氏家族文人辈出，涌现出众多的诗人和文学家，如顺治、康熙年间，李湘一脉的李良年、李绳远、李符三兄弟被誉为“浙西三李”，李良年与嘉兴一代文宗朱彝尊齐名，合称“朱李”，李良年之后李富孙、李遇孙、李超孙也工诗文而蜚声南北。关于墓葬年代，李湘其妻墓葬出土大统历记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墓志铭记陈氏卒于万历十七年(1589)，嘉靖、万历年间正是明代中期向后期服饰转型的变革过渡期。该墓发现于2006年，古墓保存较为完整，出土文物有丝织品、铜镜、帽饰、腰牌、墓志铭、文献等，其中最具特色的随葬品属丝织服饰，包括绸袍、上衣、衫、裙、裤、袜、帽、鞋、巾等30余件，配套齐全。这些出土服饰形制多样、织纹精致、图案丰富，是研究明代嘉兴地区丝织业发展和明代服饰特点的珍贵资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嘉兴地区乃至明代织造业的发展水平，展现了明代社会转型期官宦士绅阶层服饰的历史真迹。

一、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服饰概述

嘉兴王店明代李氏墓葬出土服饰品类丰富，基本涵盖袍、衣、衫、裙、裤、袜、帽、鞋、巾、配饰等日常所需全部服饰，其中袍、衫、衣、裤、裙等服饰有21件，保存相对完好的有11件，包括出土规格较高的大袖袍、大袖衫和补服。大袖袍衫是明代宗室女眷和大臣命妇穿着的礼服，补服是明代典型的官服款式，反映出墓主李氏家族的身份和地位；^[2]服饰织物纹样题材丰富、布局饱满，代表了明代中后期服饰纹样整体特点；衣料质地以丝织品为主，包括绸、缎、锦、绢等，其中有几件织金工艺服饰，如织金绸裙，织金大袖衫等；装饰工艺有纳纱绣、环编绣、绒线绣、盘金绣、锁线绣等。由于出土服饰的颜色氧化褪色严重，绝大多数已变成驼黄色，原有的色彩实貌已无从考证。

二、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服饰形态分析

(一) 新奇多样的服装形制

突破陈规、求新趋变是明代中后期服饰的社会风尚，形制上继承传统汉服上衣下裳、深衣制、袍服制的典型样式，而在局部

细节进行创新，有了多样化的突破，这种新奇多样的服装形制在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服饰中得到反映。如出土的折褶大袖袍、圆领袍、交领袍、绣补大袖袍、对襟上衣、绣补大袖衫等服装中，整体上沿承了中国古代服饰交领右衽、衣裳连属、宽衣阔袖的典型特点(图 3),但在形制细节上，不同服装款式其结构、细节各不相同，主要体现在领襟、袖子两个部位。



图 3 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服饰¹

明代中后期服饰领形由明初单一的交领向交领、竖领(立领)、圆领、方领等更加丰富多样的领形转变，从图 4 出土实物看，领襟形制有交领大襟、竖领对襟、圆领大襟，不同领形其门襟形制存在差异。其中竖领是明代服装的创新，是从明初缀扣的直领直襟发展而来，传统汉服的领缘是一通到底的结构，明人创新性地采用了长领缘的截断形式，保留围绕颈项部分和对襟结构，简化服装制作，也有利于保证胸前图案的完整性，这是传统交领、直领向立领转化的中间形式。竖领是明代中后期女服中最有代表性的领襟式样，是明人在继承传统服饰结构的基础上创造性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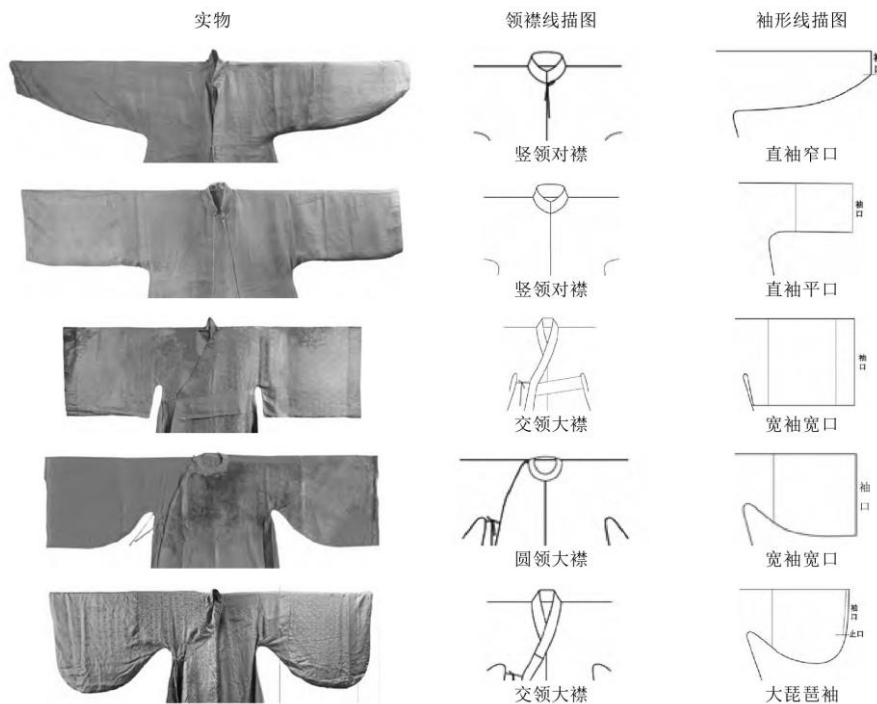


图 4 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服饰领襟、袖型图示

明中后期衣袖形制变化丰富，不同服饰类别和审美变化使衣袖式样不尽相同，依据形状、大小可分为直袖、大袖和琵琶袖。

从李氏墓出土服饰看，大体包括直袖窄口、直袖平口、宽袖宽口、大琵琶袖等，袖式都较为宽大(图4)。直袖窄口、直袖平口两种袖式见于王店出土的对襟上衣，直袖窄口的袖口采用渐收形式，直袖平口是将袖口的下半部分直接缝合，虽然两种袖式总体形制都是直袖造型，但却有明显差异；宽袖宽口服装一般作为礼服，在正式场合穿着，如李氏墓的明万历大袖袍，其形制结构为袖根部位收紧，袖幅宽大平直延伸至袖口，袖口宽大且接入缘边；大琵琶袖是明代服饰的创新，也是明制服装中最基础、最经典的形制，李氏墓出土的服饰琵琶袖袖幅都较为宽大，袖根部位较窄，下缘呈弧形，宽大袖口有部分缝合，供手臂进出。从出土实物分析来看，明代中后期服装的衣袖形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出现了创新性与多样化的趋向，直袖窄口、大琵琶袖等创新袖型都是这一时期发展而来的。

(二) 多元丰满的纹样题材与布局

1. 多样化、世俗化的纹样题材

明代中后期的纹样在前代基础上，题材、形式、品种都有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纹样有明显的多样化、世俗化倾向，各类题材巧妙地组合运用，赋予传统纹样新的时代特点和文化内涵^[3]。从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服饰纹样整理发现，其构成题材丰富、取材广泛，涵盖植物纹、动物纹、自然景观纹、几何纹及人物纹等五大类。植物、动物题材是中国传统纹样中使用最广泛的两种题材，至明清时期达到繁盛，包括品种形态各异的花卉、瓜果、松竹、芭蕉等植物纹样，以及龙、凤、螭虎、仙鹤、奔马、蝴蝶、蜜蜂等神兽纹和自然界的动物、昆虫的纹样，这些植物、动物纹样多与其他类型纹样共同构成具有丰富内涵和故事情节的组合纹样，如杂宝折枝纹、四季花蝶折枝纹、云鹤纹、凤凰牡丹、折枝凤凰麒麟奔马等。自然景观纹有云纹和水纹，其组合纹样如四季如意云纹、万字曲水纹、落花流水纹等，以及“卍”字、菱格几何纹和蕉石仕女纹等纹样题材，这些不同题材的纹样通过组合形式出现赋予其多样的吉祥寓意，反映了明中后期纹样世俗化的审美典型特征。如落花流水纹，是明代流行的时尚新意化纹样，以单朵或折枝形式的梅花，与水波浪花纹组合装饰，比喻早春来潮，寓意文雅；明万历曲水双螭蕉石仕女织金绸裙，以芭蕉、初石、仕女组合形成故事情节画面，并结合曲水、“卍”字、回纹等几何纹构成复杂、丰富、连续的纹样形式，以表达对连绵不断、吉利永长美好事物的追求(图5)。李氏墓出土的服饰纹样，取材范围之广泛，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对于多元文化的高度包容与兼容，精妙的组合与形态描绘更是江南地区织造技术发展、艺术审美独到的体现和世俗化的流行风尚。



图5 曲水双螭蕉石仕女纹

(a) 实物 (b) 织物 (c) 纹样线描

2. 充实均衡的纹样布局

明代纹样布局在传统图案构图基础上，凝练升华以至高度样式化、程式化。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的服饰织物纹样较少有单独形式存在，大多以组合形式出现，纹样构图布局饱满、均衡，以不同题材组合形成主体花纹，通过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进行重复排列，形成织物底纹，图案连续紧密、匀称规整，排列次序感突出，是明代织物纹样公式化、程式化的重要表现。如在出土的云

鹤纹绸残片中，四合如意云纹主体造型上饱满圆润，沿承传统、追求创新，与仙鹤纹组合构成服装面料的织造底纹，并以四方连续形式进行排列，形成重复的节奏韵律，表现出简约且均衡的视觉效果。在明万历折枝凤凰麒麟奔马织金缎裙的织物纹样中，由折枝花卉、凤凰、麒麟、奔马、“卍”字、人物等多种题材构成丰富的主题纹样，通过对图案进行合理排列，构成饱满且具有故事性的二方连续纹样，在视觉上实现了次序感和丰满华丽的艺术效果(图6)。王店明代李氏墓纹样布局的程式化和充实均衡的特点，印证了明代图案艺术的成熟和社会审美世俗化、求奢趋异的时代风尚。



图6 折枝凤凰麒麟奔马纹

(a)实物 (b)织物 (c)纹样线描

(三) 高贵精美的面料质地

丝织质料是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服饰的主要材料，它们厚薄不均、工艺多样，有绸、缎、绢、纱、锦、金线夹织等。其中绸、缎作为服饰的高档用料，具有工艺精致、色彩华丽、图案精美的艺术特点。

出土的绸袍、绸裙、绸衣较多，皆为提花组织，通过经纬线交错形成浮线来显花，花纹精美，光泽亮丽。缎织物在明代取代了锦的传统地位开始流行，出土服饰中的暗花缎是由改变缎纹组织来显示花纹，看上去很素雅，但不失华丽。绢属平纹组织，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的万历绢衣、绢裙较为完整，质地轻薄，坚韧挺括平整，具有光滑润美，手感柔软的特性。纱是一种纤细、稀疏、方孔、轻盈的平纹织物，由于纱组织稀疏，质地较薄，不易保存，出土的纱地荷塘鹭鸶服饰配件已残损。金线夹织，延续了元代织锦衣物的奢侈之风，采用金线与高档缎袍料夹织，纹织复杂，金线显花，织金服饰尽显富丽华贵，出土的织金绸裙可见金线夹织的工艺，裙体以暗花缎面料制成，本色花纹组织，中部以金线配织裙襕一道，色彩华丽，图案精美，工艺精湛(如图7)，这些出土服饰高贵精美的丝织质地见证了当时嘉兴地区高度发达的丝织业水平。

(四) 简洁精巧的装饰工艺

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服饰的装饰工艺较为简洁，主要采用刺绣工艺，多用于服饰及配件的局部装饰。刺绣作为出土服饰纹样装饰的主要工艺手法，包括环编绣、绒线绣、纳纱绣、盘金绣、锁线绣等。环编绣是明代服饰常用的装饰手法，采用绣编结合的形式，绣时先界定出外轮廓，之后沿图案走势行行环编，^[4]形成满地花纹。从出土的环编绣鞋实物看，鞋头缘边采用行行环编绣形成均匀的花瓣形状，并用压瓣的方式合理地安排于鞋口边缘，其绣面肌理紧致，精巧美观(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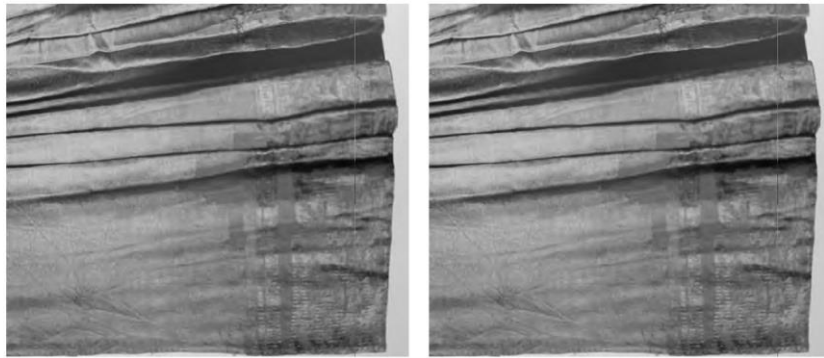


图7 金线夹织工艺绸裙



图8 环编绣鞋

盘金绣、绒线绣和锁绣在出土服饰中一般作为装饰辅助工艺，如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的官服獬豸绣补残片，以环编绣作为纹样的地纹，采用盘金绣圈出云朵和獬豸身体的外轮廓，再以金线锁绣獬豸牙齿，进行填充，盘金绣、绒线绣和锁绣等针法辅助，多种针法组合显花，图案精美、针法灵活、绣工精巧(图9)。



图9 盘金绣与锁绣

(a) 补服 (b) 盘金绣 (c) 锁绣

三、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服饰形态的成因分析

(一) 服饰制度塑造主流服装形制

服装是“衣冠之治”的物化表现。明代建立以后，为有力地维护等级森严的封建政治体制，强调贵贱有序和良贱有别的等级观念，以服饰的“礼”作为教化和治理天下、统治人民的工具，制定了帝后宗室至品官庶民的完备服饰制度。在服饰形制上，废弃了元朝服饰形制，继承历代汉族服饰的基本式样，“上采周汉，下取唐宋”，恢复和发展汉唐上衣下裳、衣裳连属的服饰传统，并不断更定，形成明代主流服装模式。

从出土服饰式样看，虽然部分服装在衣领和袖子细节上进行了创新和改革，在服饰纹样上也存在服装实物与穿着者身份的不符合，存在跨越身份的僭越现象，但服饰主体的宽衣阔袖袍衫形制未变，整体上继承了中华传统服饰右衽大襟、宽袖阔袍的主流服饰形制，这种服饰形制是在明初统治者实现严苛服饰制度下的产物。

(二) 社会风尚影响服饰审美

明代初期，在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程朱理学”思想桎梏、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背景下，服饰趋于循礼、俭朴的风格。而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市民阶层的兴起，国家政治控制力的减弱^[5]，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蜕变，使人们一改节俭的传统，热衷于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张翰的《松窗梦语》有“望其服，而知其贵贱；睹其用，而明等威，今之世风，侈靡极矣”^[6]，杭州在嘉靖中期已是“侈靡过甚”，到万历时，“今服舍僭侈，拟于王公，妇人妖艳，得为后饰物，甚至贱金银，而侈珠玉”。^[7]海盐县“民间妇人遇婚，皆服团袄为礼衣。或罗或纁丝，皆绣领下垂，略如霞帔之制”。^[8]平湖县“年来文教渐盛。风俗亦渐移易矣”^[9]。对奢靡生活方式的崇尚与追求，突破了封建保守思想的长期压制，刺激了服饰品格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使得服饰审美呈现开放自由、竞尚奢华、求新逐异的新风尚。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的服饰在衣料的选材、纹样的装饰和服饰形制的多样性方面，展现了明代中后期求新尚侈、奢靡的审美情趣和风尚，以华侈为尚成为服饰主流审美趋向。

繁复、丰满为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的服饰纹样的显著特点，如明万历折枝凤凰麒麟奔马织金缎裙，采用精湛繁复的织金技艺，涉及动物、植物、人物、几何等近十种题材组合进行织造，形成繁锁复杂、吉祥寓意的图案，这种繁丽华美、追求粉饰太平和吉祥祝福的服饰形态，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百姓崇尚和认同的审美价值观，也是当时奢靡、世俗化社会风尚的展现，体现了墓主人追求富贵的审美取向和经济实力(如图3)。由此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宽松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明代中后期奢靡和世俗化的风尚，使得服饰在式样、纹样、质料上整体呈现多元、丰满和华丽的审美特征。

(三) 地方丝织业发展提升织绣技艺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成为纺织生产的中心，苏州已是“郡城之东，皆习机业”，邻近各镇也大都“以机为田”，开始摆脱封建经济，出现纺织产业。随着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江南织绣技艺显著提高，丝织工艺技术已发展到空前水平，出现了杭州、苏州、南京等专业生产地区，苏州“其东北半城皆居机户”，杭州“城东平安里一乡之人织绫锦为业”^[10]，明万历时已是“家杼轴而户纂组”。此时嘉兴“桑柘遍野，茧箔如山，蚕丝成市”。特别是明中后期，“浙江丝绸业的重心，已有移向嘉湖一带的倾向”。嘉兴“桑蚕织绣之技，衣食海内”，并在丝织工艺发展基础上形成了以纺、织、染、绣等的新兴市镇，王店镇“也都逐渐变成千家、数千家，甚至万家的丝绸业的专业市镇”，丝织“首推纱布，而蚕丝之厂，不下吴兴”。纱布远销各地，“行于苏松衢诸郡，远及关东，商贾辐辏，收买无虚日”^[11]。明万历年间起褚绸(叔铭)、褚(明山)绫、薛绸等，名重当时。^[12]伴随着丝织业的日益扩大，进一步促进了行业技术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织金、提花、刺绣等精工技艺也得到了提升，为服饰艺术的精细制作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如“花楼机”的改进和推广，使得人们能够在面料上织出更加精致繁复的图案花纹，为服饰纹样的变化和精加工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嘉兴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的服饰上繁复精美的纹饰、高贵精美的质地和精巧细腻的工艺进一步佐证了明代嘉兴丝织业的兴盛和高度发达的织造水平，展示出明代嘉兴地区高超的织绣技艺。

(四) 政府控制力弱化、商品经济发展、异端思想兴起等激发创新意识和产生僭越现象

明代中晚期，尤其是正德至万历时期的一百多年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发生了新变化。正德帝、嘉靖帝和万历

帝荒于朝政，政府对社会制约力和干预力逐渐弱化，制度松弛紊乱，官员服饰违禁事件屡禁不止，庶民服饰逐渐突破等级规定，政府禁令逐渐失去法律效力，导致服饰奢靡和僭越现象日渐增长，如明嘉靖《吴江县志》载：“习俗奢靡，故多僭越。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不能顿革也。”^[13]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盖上禁之固严，但赐赉屡加，全与诏旨矛盾，亦安能禁绝也！”^[14]江南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使人们的眼界逐渐开阔，表现在服饰穿着上则是对款式、色彩、纹样、衣料的要求越来越高，呈现日新月异、千姿百态的时代特点。经济的繁荣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明代中后期日渐僵化的程朱理学逐渐崩塌，阳明“心学”思潮兴起，强调“心”的主宰作用和主体的自觉性，并逐渐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心学”主张“心即理”，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其后更是将心学推向极致，泰州学派的宗师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论物矣”^[15]，剔除了人伦物理上的神圣光圈，使其成为世俗化的事物。肯定人欲，倡导个性解放，使得人们的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或多或少带有世俗化的倾向，这种思想为服饰的创新、逾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引发人们在服饰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上的多元选择，使服饰风尚逐渐突破程式，呈现求新、求异的流行趋势。

在这种政府控制力弱化、商品经济发展、异端思潮文化的影响下，服装形制不断创新而形式多样化，服饰纹样、质料等突破前期等级制度的清规戒律，僭礼越制，日趋奢华。嘉兴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的奢华服饰随葬品，为考证明代中晚期服饰文化演变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依据。如，出土的三件竖领对襟上衣，其中竖领结构是明代服装式样的创新，明人创造性地采用长领缘的截断形式，简化服装制作，同时穿着方便实用，一定程度上是心学“肯定人欲”价值的反映；出土的麒麟绣补云鹤团寿纹绸，是典型的明代官服款式，而正德十三年(1518)有“文臣服色亦以走兽，而麒麟之服逮于四品”规定。^[16]李湘因其子李芳而封为文林郎，七品官按补子的官阶限定没有资格服麒麟补子，墓主李湘麒麟之服显然有僭越现象，服饰上的僭礼越制现象反映出晚明政治控制力的减弱、商品经济的发展、异端思潮的崛起，封建等级社会和纲常名教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四、结语

王店明代李氏家族作为嘉兴地区的名门望族，其穿着服饰不仅反映着明代中后期宦官士绅服饰的风格特色，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特质，其形制新奇复杂，纹样多元丰满，质地高贵精美，装饰简洁精美，既有对古代传统服饰文化基础的继承，又有结合时代审美特征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明代中后期服饰形态特色与风格的反映，同时也是王店李氏家族身份和地位的展现。

嘉兴王店明代李氏墓出土的服饰气势恢宏，保存较为完整，是研究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和纺织技术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是探究明代中后期服饰制度、社会风尚、丝织业发展、思潮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料，值得相关学者继续挖掘思考。

参考文献:

[1]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M].上海:上海书店,1991:52.

[2]吴海红.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J].东南文化,2009(2):53-62.

[3]华强,张宇,周璞.明代中后期服饰风格与趣味的嬗变——以王洛家族墓出土纺织品为例[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4):55-58.

[4]蒋玉秋.明代环编绣獬豸胸背技术复原研究[J].丝绸,2016(2):43-50.

[5]王熹.明代服饰研究[M].北京:中国书店,2013:209.

[6]张翰.松窗梦语:风俗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

-
- [7]陈善. 杭州府志: 卷十九[M]. 刘伯缙修, 刻本. 1579(万历七年).
- [8]樊维城, 胡振亨. 海盐县图经: 卷四风土记[M]. 刻本. 1621(天启四年).
- [9]吴仰贤. 嘉兴府志[M]. 许瑶光, 修. 刻本. 1878(清光绪四年).
- [10]卢兴基. 失落的“文艺复兴”: 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32, 37.
- [11]杨谦. 梅里志: 物产卷[M]//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97.
- [12]黄承昊. 嘉兴县志: 卷十七[M]. 罗炯修. 刻本. 1637(崇祯十年).
- [13]徐师曾, 曹一麟. 嘉靖吴江县志·卷十三[M]. 刻本. 1561(嘉靖四十年).
- [14]沈德符. 麟衣[M]//万历野获编: 卷一北京: 中华书局, 1985:20-21.
- [15]李贽. 焚书: 卷一[M]. 刻本. 1590(万历十八年).
- [16]輿服志[M]//明史: 卷四十三北京: 中华书局. 1987:1751.

注释:

- 1 本文所引用服饰图样源自嘉兴博物馆《明器载道·嘉兴博物馆馆藏文物·明墓器》。